

廣西文史資料

第十七輯

K230.6
67
2:17

廣西文史資料

第十七輯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七月

B 034136

目 录

回忆《民主星期刊》桂林版的出版.....	靳为霖 (1)
抗日战争结束后广西日报柳州版的出版与被迫改组	吴克清 (16)
关于创办《桂林工商日报》的经过.....	赵浩生 (21)
回忆曙光报.....	黄汉杰 (26)
抗战后期活跃在桂东敌后的广西日报.....	陆君田 (32)
“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回顾.....	汤有雁 (39)
我所知道的杨东莼和他所主办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 学校.....	陈宪章 (60)
墨墨之火.....	吴天佑 (69)
新安旅行团在桂林.....	唐振元 (78)
北伐革命前后的南宁三师学校.....	黄露西 (86)
钟毅将军生平事略及殉国经过.....	钟 仲 (97)
我所知道的钟毅师长殉国经过.....	莫树杰 (104)
史莱特莱友好访问钟毅.....	袁雁沙 (106)
忆爱国华侨——空军吕天龙同志.....	宗之璞 (112)
抗日战争初期的广西三青团.....	黄立志 (119)
地下党在三青团广西支团的活动.....	李朋章 (133)
我所知道的广西三青团的内幕.....	覃泽汉 (142)
西安事变与新桂系军阀.....	赖慧鹏 (155)
西安事变时桂系的态度.....	龙泽应 (158)

红军长征中的白崇禧“开放”湘桂边境内幕·····	汤 奎 (160)
西南事变时蒋介石想利用我倒陈济棠的一幕·····	林 虎 (164)
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时我的见闻·····	以云幕 苏德润 (169)
解放前夕桂系反动集团对人民所犯罪行的片断回忆 ·····	蒋道宽 (1821)
剿办合浦县东部刘朱华股匪的经过·····	李洁之 (193)
我所知道的白崇禧·····	虞世熙 (203)
广西圣公会简史·····	广西基督教三自爱国会 (219)
黄绍竑控制下的广西省银行·····	郑家度 (226)
三十年代的梧州鸦片批发商·····	招荫廷 (237)
清末民国年间南宁盲人史实·····	刘惠权 刘其椿 (241)
钱兴夫妇在桂林脱险经过·····	盛今廉 (250)
钱兴同志在灵川的住处·····	阳雄飞 (253)
苏曼等三烈士在敌人审讯中被迫害经过·····	唐高毅 (255)
陆川访李记·····	秦 似 (257)

回忆《民主星期刊》桂林版的出版

(一)

一九四四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湘桂战事，广西不少地区相继沦陷。一部份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和进步人士决心留在广西坚持斗争，他们从当时号称文化城的桂林转移到八步、昭平一带，并在八步成立了民主同盟东南总支委员会。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正式降落，抗战胜利，形势变化很快。民盟东南总支结束，一部份成员去重庆、香港和其他地方，多数人仍回桂林，并在桂林建立了民盟广西支部；当时支部的领导成员有欧阳予倩、徐寅初、张锡昌、周康仁、李镇等同志，后来还有张毕来、曹柏寒、杨荣国等同志。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从重庆回到桂林，亦被作为支部委员，负责宣传工作。我对支部介绍了在重庆了解到的当时的政治形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要求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情况，尤其是关于国共谈判、双十协定，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和民主同盟的政治主张及活动情况。大家深感自从一九四四年湘桂战争日寇进占广西以后至今，原来的文化城桂林情况已经大变，民主运动和文化空气都大不如前。现在桂林没有什么进步报刊出版，重庆、上海、香港等地的进步报刊也不易看到，《新华日报》只能在少数人中传阅，大家感到消息闭塞，民主运动较为沉寂，有必要在桂林出版一个刊物，及时介绍政治形势，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还可转述中共的重要政策和意见，以推进桂林及广西的民主运动。那时在

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刊物要办申请登记手续，经过新闻检查机关批准才能出版，要办一个新刊物很不容易。当时由陶行知同志任发行人，邓初民同志任主编的民盟重庆支部的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已于十月间在重庆创刊，我们认为由民主同盟广西支部出版《民主星期刊》桂林版，还较易实现，当即由我写信去向邓初民同志联系得到了他的赞同和支持。于是我们一方面仍依“法”办理申请登记手续，一方面就先行出版了。

旧政协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召开，《民主》桂林版紧接着一月十二日创刊。在最初几期着重刊登了有关政协的一系列文章：“周恩来同志、民盟张澜主席关于政协的谈话”，“周恩来同志的答记者问”，“民盟南方总支部主席李章达对政协之谈话”，“李济深先生对国是意见”，“冯玉祥将军上蒋主席书”，“陪都文化界人士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以反映全国人民对政协的意见和希望，对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民主、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等的迫切要求。我们连续发表了几篇社论和报道：“全国人民注视着政治协商会议”、“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是人民说话和行动的时候了——督促政协会的成功”，以报道政协会议的进行和斗争情况，敦促会议取得进展和成功。政协闭幕后我们及时刊登了政协所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全文，发表了“为实现和平建国纲领而奋斗”、“政协会前后”、“政治协商会议以后”、“拿出诚意和决心来”等社论和报道，就政协的胜利闭幕和所取得的成果作了阐述，并指出还必须为其实现作艰巨的斗争。

在政协会上斗争最尖锐而尚未完满解决的还有四个重大问题：军队整编、政府改组、国民大会、东北问题，《民主》特地为此进行了报道和写了专论：“化党军为国军”、“透视政府改组问题”、“谈国民大会诸问题”、“我们对于东北问题的意见”，并刊载了“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对东北问题的谈话”和民盟中央所办的《民主报》社论“东北问题”，以介绍斗争的关键

所在和提出了我们的看法和意见，让大家看到矛盾还大，问题仍多，对形势要有清醒的认识。

政协决议的墨迹未干，国民党就先后紧接着召开了它的六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国民参政会。这两个会不是为了拥护和贯彻它们的蒋总裁和代表所参加的政协通过的决议，而是为了推翻和撕毁政协决议。它们在会上悍然提出要反对和修改政协决议的原则，要召开十年前所“选出”的旧国大代表会，显然国民党顽固派已是决心要走破坏政协、继续独裁、坚持内战、反动到底的道路。《民主》介绍了这两个会议的情况，揭穿了它的欺骗卑劣手法，刊登了中共、民盟、国民党中的革命派别及有关人士的评论和抗议；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谊会、中国国民党福建省党务改革委员会、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务改革委员会、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务改革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来件：“我们对于本党六届二中全会的表示”，转载了《民主报》的社论“读蒋主席在参政会演词”、“政府不能改组的内幕”和“对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抗议”，还刊登了重庆特讯：“民盟张澜主席就国民党二中全会违反政协决议对记者发表谈话和重庆《民主星期刊》主编邓初民同志评论国民党二中全会是顽固分子妄图保持独裁的谈话；《民主》桂林版还连续发表了社论及专论“是否准备彻底放弃一党专政”、“飘浮无根的国民参政会”、“从政协到参政会”，并特地刊登了桂林文化界联谊会举办的时事座谈会的记录专稿“政协会后国内局势的新认识”，文章指出：政协带来的光明，被重庆的浓雾遮蔽了；国民党二中全会中顽固分子的蛮干，参政会中尾巴主义者的盲从，动摇了政协决议的基础；我们需要重新估计和认清局势，需要揭破法西斯顽固分子的阴谋，需要作保卫政协决议的坚决斗争，并引用了民盟张澜主席的话：“只要不怕大打小打，拆穿大骗小骗，民主才有光明前途！”

在这一期间，《民主》还相继刊登了“反内战运动与昆明惨案”的报道和昆明学生为“一二一”事件告各界同胞书，中国民

主同盟发言人为昆明惨案发表谈话，“二月十日的陪都——记二一〇重庆较场口血案”，《民主报》社论“人权保障，必求兑现”。还报道了北平封闭了七十七种报刊，广州捣毁了兄弟图书公司，上海禁止了《消息》、《文汇》、《新中国》等多种杂志的出版，各地的进步书刊和书店相继受到摧残。南京更发生了毒打上海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请愿代表团”的《下关血案》。

国民党顽固派和特务组织，对中共的地下组织和党员进行破坏、逮捕、谋杀早已在暗中进行从未停止过，现在是对第三方面的民盟也不肯放过了。西安的特务谋害了民盟的王仁、李敷仁同志，昆明刺杀了民盟中委李公朴和闻一多同志，北平绑架了民盟市委孙中原，成都竟公然辱殴民盟主席张澜和民盟四川省委张松涛。

《民主》及时报道了上述这些情况，揭露了国民党法西斯的专制和恐怖行为，发表了各方面的抗议和斗争情况，让人们清醒地看到政治形势的逆转和突然事变的正在发生，要有必要的应变准备。

《民主》还以相当的篇幅报道了广西的灾情、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民主运动情况，如“生活在宾阳国中”、“饥饿中的罗城人”、“征军粮在龙岸”、“高利贷榨干了桂东农民的血汗”、“窒息中的山城”、“一个被无理开除的女学生的控诉”等通讯。这一期间，广西曾先后举行过各种全省性的会议。《民主》对救灾、教育、参议等会都发表了相应的社论或文章，并写了专门的社论“广西的道路”，指出：“广西不少人能强调团结、安定、进步，倡导和平竞赛及实行民主，但亦有人主张‘讨伐’，反对土地改革的进步政策，并坚持分裂路线。”我们认为：“中国不能再遭受战祸，创痛最深的广西更不能遭受战祸，广西不能也不忍再听见主战的声音；中国需要和平、团结、民主，广西更需要和平、团结、民主！”“当此全国面临最严重的关头之际，争取和平民主，推动和平民主之实现，乃为广西目下的正确

道路。”但是，在省议会会议的选举中，对于一些选票上的“锡”字误写为“锡”，当时较为开明的李任仁险胜了反动的陈锡珙，桂系当局却还是违背了广西人民的意愿，没有接受我们的劝告，选择了追随蒋介石反动到底的道路，也是他们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美国的反动对华政策，主使和支持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战争、独裁、分裂的立场。美国片面援助国民党一党政府，帮助国民党运输军队，援助国民党军需军火，代替国民党守护铁路交通，驻华军队久久不肯撤退，直接间接的协助国民党军队打内战，以致将中国的内战局势激发到比美国未进行“调解”之前还更为惨酷及严重。美国这种错误的对华政策，不但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指责和反对，真正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也提出了他们的严正抗议和主张。为此，《民主》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使人们对美帝的真面目有所认识，如本刊的专稿和评论：“中美合作与中国内战”、“美应改变现行对华政策”、“笑里藏刀的美国对华政策”，民主同盟在上海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民盟对美国的态度，反对军事援助国民党，反对美军驻华”；我们还转载了《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装备和训练的中国军队没有打日本，却在屠杀学生！”《大美晚报》的“美国剩余物资与中国内战”；我们还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为了美国的支持和援助，竟无耻地将国家的空权、航权、海关权都奉送了给美国，某些行政和经济上的管理和指挥也听命于美国，甘心再走殖民地的老路，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国。为了揭露和抗议美帝的侵华罪行和国民党的丧权辱国罪行，我们还转载了《文萃》杂志的“美军在华暴行录”和发表了本刊上海航讯：“响应‘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在上海”。

阴云在扩大，逆流在泛滥，战火在燃烧。在美帝的主使和支持下，国民党既然决定坚持走一党专政的独裁反动道路，必然地加紧了它的特务统治，法西斯暴行和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前一时期的边谈边打，谈无诚意，打有决心，已经实际上发展为全面

内战，东北、中原、苏北、山东、晋南、河北、热察的战火都在越烧越旺。《民主》在时事评述中写了“透视庐山的迷雾”、

“内战的军事形势”、“全面内战展开以后”、“张家口战役之后”等文章，指出：“当时国民党得到美帝的支援，虽然在兵力武装上还处在优势，但中共在“解放区的军队，为了便于消灭入侵敌人的有生力量，有时暂时地退出一些城市，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中共以“你拿这里我拿那里”的战略方针，将战场扩大，使国民党军陷于无兵可调、无兵可补的困境。到了中共撤出张家口，国民党决心内战到底，伪国大开会前夕，国民党军队伤亡、被俘、起义的官兵总共已达四十万人以上，占他的兵力十分之一。十月间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的时评中说：

“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损失到一定程度时，解放区便可以大举反攻。”还说：“进犯军由战略攻势转为战略守势，解放区军民由战略守势转为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不远了。今后几个月，将是这个重大转变的关键。”我们分析了形势及其发展，鼓励大家在困难面前不必灰心动摇，对胜利的前途要有充分的信心。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不顾中共、民盟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开了伪国大代表会。中共认为已无谈判余地，代表团撤回延安，大战即将全面爆发。《民主》一连发表了两篇关于国民大会的社论，指出没有中共和民盟参加的国民大会，只能是一个破坏政协决议、违反全国民意、招致全面分裂的会议，将使中国人民陷入长期内战再受战祸痛苦的惨境，悍然单独召开国大的人，应负此历史的责任。《民主》还在每周的时事述评中，介绍了中共和民盟对召开国大的声明和抗议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国大召开后的政局和军事态势，周恩来同志曾经公开对记者宣称，国民党大军大规模集结陕甘宁边区四周，准备大举进攻延安；延安《解放日报》的时评“到进犯军的后方去”里说：“我们实行全面坚决抵抗，在正面当我们有计划撤离城镇时，除了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外，要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使国民党一无所

获。同时派遣小型武装到进犯军后方去，进行无数的小规模歼灭战，以配合歼灭大量敌人的大规模的运动战。国民党军损失到一定程度时，解放区便可以大举反攻，最后把国民党军赶出去，收复一切失地。不难看出，一方表面上是在“丧城失地”，一方实际上是在损兵折将，几个月作战的结果，国民党的兵力已被消灭了五分之一，经济政治的危机又极度深刻化，而中共则作战机动坚韧，有生力量在迅速的生长，而且有收复失去的城市的力量了。我们指出：“反民主反和平的力量和争民主争和平的力量互相消长，我们看见了新中国的远景，新的一年，应该是扭转中国历史的转捩点了。”

《民主》还发表了民盟张澜主席对国大问题的意见，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秘书处紧急通告，中国民主同盟招待新闻记者谈话，坚决维护政协决议，拒绝出席国大，表达了民盟的鲜明立场。

在这紧急关头，《民主》桂林版以坚定的立场和明确的态度，向读者指出：反动派的图穷匕现，正是“日落西山、气息奄奄”的迴光反照。在这黑暗的尽头，国民党的“劝、禁、封”或“争取、孤立、逮捕”等三部曲将会到处上演。我们勉励大家一定要坚定自己，照顾朋友，善于斗争，光明是必将到来的。

(二)

《民主》桂林版是在旧政协召开，国民党被迫表面上主张民主和言论出版自由的形势下创刊的。当时为了进行合法斗争，取得主动权，一方面我们仍按国民党的“法”进行了申请登记的手续，一方面以实际行动争取出版自由，不管它批准与否，就开始出版发行了。与此同时，徐寅初、张锡昌还以民盟广西支部负责人的身份，接着我又以《民主》负责编辑的身份去见当时的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向他打了招呼 and 表明了我们的鲜明立场和态度，使得新闻管制机关和特务人员一时不便公开对民盟的活动和《民

主《民主》桂林版的出版进行破坏。但是他们立即就在发行上着手阻挠。我们在第一期上只发表了编辑兼发行，“民主星期刊社桂林分社”、总经售处：“桂林桂西路三十号”，他们借口没有负责的人名和经售的书店不能发行。民盟广西支部经过研究，既然决定公开出版，就要不计个人安危，敢于斗争，于是，在第二期上公开发行人周匡人（即周康仁），编辑人为徐寅初、张锡昌和靳为霖，经售处为桂林文化供应社。我们就以公开的面目和立场进行战斗了。但是文化供应社当时虽由国民党革命派的陈劭先领导和主持，该社工作人员中还有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公开上却仍是国民党桂系的官办书店，他们从内部进行威胁不准它当《民主》桂林版的总经售处。我们又动员和帮助当时我弟弟靳为义经营的以经售文具为主的兴华教育用品社作为经售处而维持了下去。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桂林文化界联谊会、文艺界协会桂林分会、美术工作者协会、桂林妇女界联谊会、桂林师范学院学治会等团体联合发起《五四》纪念会。老教育家林砺儒同志主持了会议并介绍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和重要意义，诗人穆木天同志讲述了当前文艺要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而奋斗，欧阳予倩、靳为霖两同志在谈到当前政治形势和民主运动时，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救济物资支援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两个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言，表达了桂林学生和青年继承《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为争取和平民主、建立联合政府的坚强决心。会议开得很活跃很成功，受到了桂林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的欢迎和支持。特务分子和桂系当局对此却感到非常不满和恼怒，要对会上的主要发言者进行迫害和公开镇压民主运动，破坏《民主》桂林版的正常发行。他们密谋策划，由广西特务头子梁学基写了一篇所谓记者报道，诬蔑欧阳予倩、靳为霖在会上说联合国的救济面粉有毒不能吃，要广西的灾民饿死（当时广西发生战后的的大灾荒，已饿死不少灾民，正向全国呼吁请求救济），然后由中央日报（广

西版)根据广西日报的这段造谣消息发表社论,攻击我们没有人性,要广西灾民拒吃救济面粉,宁可饿死,公然制造舆论,进行煽动,激起公愤,以便对我们下毒手;接着将由伪桂林市长苏新民出面召集流氓打手组成的“灾民”队伍前往靳为霖住处寻衅殴打和捣毁经售《民主》的兴华教育用品社。梁学基费尽心机搜罗枯肠所写成的又臭又长约两千字的所谓新闻稿,于五月四日当天深夜送到广西日报,由伪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亲自出面命令发表。广西日报的副总编辑吴克清同志(民盟成员)看到后,认为报道与事实不符,全属捏造,不能刊登。社长李微也感到发表这样的造谣通讯对广西日报不利,经争取得到黄旭初的同意,对原稿内容作了较大的删改,并去掉了林砺儒、欧阳予倩的名字,只指名攻击靳为霖一个人。于是以“师范学院纪念《五四》”为题的新闻,由广西日报立即赶排出来,于五月五日见报。报道中有一段说:“最后由靳为霖演说,靳氏警告国人不要随便接受外国人救济。际兹灾荒严重,亟待联总物资救济之际,有此言论,听者甚感诧异云。”但是,中央日报(广西版)第二天发表的《竟无人性如此》的社论,却是根据他们事前商定的梁学基的原稿内容撰写的,没想到广西日报发表的内容已经作了较大的删改,因而失去了立论的根据,反而真正成了一篇谣言世家自我暴露的典型。现在虽已事隔三十多年,我们还很有必要费些篇幅摘抄几段,以立此存照,奇文共赏。这篇以“竟无人性如此”为题的社论凶相毕露地说:

“新法西斯主义者和旧法西斯主义者本质上并无不同,方法上亦无二致,一样灭绝人性,不讲人道。……当它们的权力尚未建立或巩固的时候,人人是戈培尔,用美丽而动听的说法,高唱民主以媚惑人心;当它们一旦握有大权之时,便顿时翻脸,个个都成为希姆莱了,露出专制的真面目。……中国共产党及其外国分子等新法西斯主义者因为偿其亡国之愿,一样的进行灭绝人

性，不讲人道，蹂躏人权的阴谋。……前天本市有所谓文化界联谊会者，假纪念《五四》之名，而畅述灭绝人性的话，广西日报昨日三版市闻，是一个例证。……联合国复兴建设的基本是本诸合作互助而产生善后的救济。这被救济者连败了的侵略国也在内。这种合作互助亲爱精诚的热忱，有人性的人，决不会任意加以侮辱。但是所谓桂林文化界联谊会上，竟有人说这种救济含有毒素，好像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救灾民不受救济。我们不知道这种无人性的话竟会出诸以文化界人士自命的知识分子之口。只有强盗土匪对灾民会坐视不救，甚或劫舍打家，因为盗匪根本已失却了人性。然而盗匪因自己饥寒而出此下策，原属不得已之举。但是自己饱暖的此辈知识分子，却抹杀了良心说话，叫人饿死，他们的企图是显然的，完全是没有人性的歪曲论调，丑诋政府，麻醉人民，污蔑盟同，欺骗人民。何以竟无人性而一至于此呢？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新法西斯主义者本来面目之暴露了。我们要正告抹杀良心的无人性者。……你们说无人性的狂言，会自绝于青年，受社会的摒弃。……自己不愿救灾……更从而侮辱救灾，愚弄灾民，何异于希姆莱，甚或狠毒过于希姆莱，竟要灾民活活饿死！”

这篇满腹杀机的社论，不但未能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煽起对我们不满的仇恨之火，反而让群众看清了他们的拙劣伎俩和险恶用心。人们说，广西日报头天的消息只是报道“斯氏警告国人不要随便接受外国人救济”这么简单的一段话，怎么一到中央日报的笔下，竟演变成了救济有毒，要饿死灾民，狠毒过于希姆莱？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卑劣手法，才是比造谣专家戈培尔还戈培尔！比特务头子希姆莱还希姆莱！民盟广西支部从广西日报盟员处及有关人士方面知道了特务分子策划的内情，经过研究

之后，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以防意外，并决定坚决予以回击。由靳为霖致函广西日报要求更正该报所发表的失实的新闻报道，并且说明了靳为霖本人早在三月间就实际参加了广西的募捐救灾活动，还写了“饥荒、失业、疾病、死亡在煎熬着广西的一千四百万人民”的通讯，报导了广西的灾情，控诉了联总的拨救济物资过少，呼吁对广西灾民给予急赈，并已在重庆《民主报》和香港的报纸上发表，靳为霖早已为广西的救灾运动贡献了力量，用事实揭穿和批驳了广西日报和中央日报的造谣攻击和阴谋迫害。在广西日报副总编辑盟员吴克清同志的支持下，靳为霖的信以来函照登的方式为之发表。但在排版后，被该报副总经理特务分子陈学涵叫人抽掉了。吴克清同志深夜看报纸的大样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又果断地叫工人补排了上去。靳为霖的来函见报后，让人们看到广西日报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无异于承认了报道失实；尤其是使中央日报（广西版）的社论，失去了立论的根据，国民党CC分子和桂系特务联合策动的迫害桂林民主人士、镇压民主运动、打击《民主》桂林版的阴谋，从而更加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我们还在《民主》上刊登了中外报刊及通讯社批评胡佛及联总分配救济物资不公和助长蒋介石打内战的综合报道，让人们看清中央日报所歌颂的“联总救济”的“人性”到底是怎么回事，更有力地驳斥了他们的诽谤和诬蔑。

但是，特务还不甘认失败，仍然不肯罢休，他们又把梁学基原来写的那篇攻击我们说面粉有毒，要灾民饿死的“发难”文章改头换面，以曾亲自参加了“五四”纪念会的读者“赵大公”来函的名义，强迫广西日报发表，妄图反驳靳为霖的来函声明，为他们的造谣诬蔑作辩护。然而事与愿违，它不但不能为特务的卑鄙伎俩和拙劣手法遮丑，反而让群众更加认清了他们的险恶用心。人们嘲笑说，“赵大公”乔妆打扮一出台，更是越辩论越出丑，越暴露了特务的狰狞面目，“赵大公”真是“造大公”，还是个“糟大公”。

举办《五四》纪念会的桂林文化界联谊会等五团体，当即联名致函广西日报驳斥了“赵大公”的谎言，指出《五四》纪念会那天并没有“赵大公”其人参加，赵君究系何人，要求广西日报“查明真相，以免混淆视听，并请贵报将此函刊布，以昭大公。”桂林文化界联谊会还发表了重要声明，将中央日报（广西版）《竟无人性如此》的社论全文刊录示众，予以严正批驳，指出：“中央日报一向专以攻讦民主派人士为职志，含血喷人不止一次，我们认为没有跟他辩论的价值与必要；但这次的任意诬蔑，破口谩骂，含有极阴险恶毒的阴谋，我们不能不予以揭破。……中央日报社论所说的‘完全没有人性的歪曲论调’，‘污蔑盟国，哄骗人民’等等，正是这班人的‘夫子自道’！我们今后对于这些恶意的挑拨与无理的污辱，必继续予以严正的反击。我们当以更大的决心，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

广西日报在黄旭初的命令下，不准再刊登我们的任何来函和声明。为了打破他们的新闻封锁，《民主》桂林版将我们的各次函件、声明及《五四》纪念会上各人的发言记录全部刊登，充分揭露了特务的险恶阴谋，让群众认清事情真相，坚决和他们斗争。而广西日报和中央日报（广西版）对此却噤若寒蝉，回避答辩，显然是自己认输了。伪桂林市长苏新民原策划组织流氓打手伪装“灾民”前来凶殴撕为霖和捣毁经售《民主》的兴华教育用品社的阴谋，看到在舆论上已经失败，人心向着我们，他自己理不直气不壮，感到难于发动“群众”，被迫暂时停止了行凶捣乱的罪恶活动。桂林的民主和进步力量，击退了反动派这次猖狂进攻，守住了阵地，并获得了更多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的支持，进一步开展了桂林和广西的民主运动，《民主》桂林版也坚持编辑发行，继续战斗下去，并获得了更多读者的拥护和扩大了发行额。

这次被称为的“面粉有毒事件”就这样被我们揭穿和击败了。但是，特务分子是不死心的。不久，他们就逼迫广西日报撤

换了当时抵制最力的副总编辑盟员吴克清同志，后来还辞退和逮捕了在广西日报工作的地下党员和盟员，欧阳予倩同志也被迫辞去了广西艺术馆馆长的职务而离开桂林转往上海。特务分子和桂系当局的倒行逆施，并不表明他们的强大，而更显得他们的虚弱，感到末日快到，只好作垂死的挣扎罢了。

随着国内形势的恶化，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的迫害也在加紧，它对各地经售《民主》的书店和读者施加压力，不准代售和阅读，造成了《民主》发行和传阅的困难。终于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他们向《民主》正式开刀，借口《民主》桂林版没有经过依法登记，派人到经售处的兴华教育用品社把出版以来的《民主》全部没收。我们立即提出抗议，发表了“本刊被查禁敬告读者的公开信”，同时致函民盟总部就近在重庆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重庆《民主报》及时发表了有关的消息，给予我们以大力的支持。我们在抗议中指出，远在九个多月前《民主》桂林版就已依“法”办理了登记手续，直到前来无理没收的昨天和执笔的现在，还没有接到过新闻管理机关不准出版的通 知；在《民主》创刊时我们曾当面向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打过招呼，他也没表示过异议；对于言论出版自由，国民党当局也多次作过允诺；可见《民主》的出版是合理合法的，对《民主》的查禁没收则是无理非法的。我们宣告：《民主》仍将继续出版！遍及广西各地的读者纷纷来信和来社向我们表示声援。有的人担心在书店已不能再买到《民主》，特地汇了钱来订购，要求直接寄给他们；还表示万一《民主》不能继续出版时，订款愿作捐款，不必退回。一位知道内情的读者还特地提供了决定检查书店和没收《民主》的前后具体情况，使我们的抗议和斗争更有依据和更有力量。我们以继续出版的实际行动蔑视国民党反动派的没收和查禁。由于当时和谈还未完全破裂，以及我们的严正抗议，民盟中央和各方有力的支援，桂系当局也还不敢把坏事做绝，我们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民主》又能在各书店同广大读者见面了。在邮局工作的进